

学做工：研究所的论文指导与学术工作^①

● 蔡如音^②

《学做工：研究所的论文指导与学术工作》是我在当菜鸟助理教授阶段的文章。当时，做研究算是得心应手的，教学再怎么讲，也不会完全陌生。论文指导，由于在独立研究所任教，没有大学部学生的缘故，责任比重相对高，有质也有量的压力。直接面对的，就是如何衡量自己能收多少学生、收怎样的学生，指导怎样的论文题目，和如何指导？

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论文指导介在服务与教学之间，是自由度极广、注重互动性的“工作项目”（是工作吗？一开始我不怎么确定，文章写完后就肯定了。）前辈们总轻描淡写地说，“由指导老师自行决定如何带领学生找到论文方向，直到论文产出毕业”。就这样，这事好像又回到一个 case by case，关起门说话的状态。

既然没有 SOP（其实有些老师是有的。但当时除了缺少经验之外，我可能还认为像指导论文这么高度异质化的事不适合套进什么标准流程），我也只能边指导边理出头绪，遇到困顿便写进工作笔记。起初，我并没有打算把这个经验写成研究，考量到过程的高度个人化，无论是沟通接收指导，研究过程，或人生状态，其实是两方的变数，是身为指导老师的我跟学生在特定时期的关系。即使没有保密协定，也有某种程度上的互信，如此个人化的经验，面对的甚至不是学理、学术的问题，该如何公开呈现、再现？这么做的意义又是什么？

先回答意义的问题。

第一层意义是个人主体的发展，是学作大学老师、认同劳动的一个过程。

① 本文来源：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Vol 9 (3), 2008.

② 蔡如音，台湾师范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

教学、研究、行政与服务是大学老师皆会面对的工作大项，但促成这些工作的劳动硬软体条件则南橘北枳，如同我前面提到独立研究所的特性，小环境的生态，会受大环境（公立体系、私校、教务方针、国际化等）支配影响。我认为，主动去留下纪录，从自己与机构、结构与文化的关系中获得反身性洞悉，会是支撑自己能不能继续走学术这一行的关键。

大学老师授课、演讲很平常，但论文讨论“碰挺”（meeting）现场却很难观察参与。我选择关注论文指导，就是因为它是相对隐形的教学工作，但却又实实在在地占据了脑力、心力与时间，它产出的不仅是论文，还有人与人的关系。写出来或许琐碎，但公开、再现带来了第二种意义：社群与对话。虽然一开始，我单纯地只想在教师社群中取暖，但慢慢地，我的对话对象变成了研究生，我把这篇文章放入了像是研究方法或是质性研究课程，让写论文跟指导论文的经验可以直接在课堂上讨论，而非只是私下询问与径自不安。或许这种公开学与教的过程，能带来一点点支持的力量，写论文是需要支持网络的。

接下来，回到如何再现论文指导的提问。

“老师，给签吗？”（告白中）

“其实不是你，是我……”

论文指导的过程里，学生与老师两方都可能充满各种内心小剧场。我常常下意识地闪躲着这些个人情绪，总认为自己应该维系专业形象，把守情绪劳动的准则。但如果我拒绝正视自己的情绪，我能理解学生所面临的状态吗？我又如何带领他们进入以理解、人本为主的研究世界里？我想再现的不是客观咨询，而是有主体声音的互动。

我决定找几位刚毕业的学生进行访谈，回顾他们成长、研究与书写论文的经过。聆听与对话的当下，他们不再是我的指导生身份，我也不再是论文指导老师，这个对话让我们都跳出原来的身份位置，重新诠释当初的经验。

就书写策略来说，我聚焦我与三个学生的互动，从访谈资料中发现我们之间的张力，再运用剧本、短篇等虚构手法重新编排，透过这个方法再现论文指导的情境与台前台后的小剧场。

有学生问我十年前跟现在的论文指导方法有不同吗？我说，现在我比较直话直说，没那么多内心戏、小剧场了。跟写这篇文章有关吗？其实是有的。

写这篇文章让我发现，在指导论文的路上，理解我的学生是怎样的人是重要的。这样我才知道如何跟他沟通，如何同理他的出发点，但又激励他踏出舒适圈，将论文作为与他人沟通之路。

写这篇文章也让我有些惭愧的发现，我对自我的再现，似乎太工整了，这让我格外想投入实际的学术劳动现场，把握跟学生相处时的碰撞与灵感。这么难得的教师成长机会，我何必在乎某种高来高去的形象呢？

最后，写这篇文章对我来说，让我找到甘愿劳动的内在力量。这件事情其实没有那么理所当然，因为，热情热血在新自由主义社会里很容易就被磨灭掉。过劳的学术劳动体制下，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将自己异化为螺丝，或是将自己抛入激化的竞技场里，寻求认可。后菜鸟的时代，虽然不再莫名热血，但我知道再生热血的根源与必要，也就是与新世代面对面。

实在是非常感谢这篇文章有机会能以华文与新读者见面，这一直是我多年来的梦想。也敬请指教。

* * * * *

我刚开始在台湾师范大学教书没多久，就有一位研究生跑来我尚简陋的办公室，问我是否能成为他的论文指导。他对台湾夜店文化的场景感兴趣，而我既然是因为文化研究的职缺而被雇用，应该是合适的讨论对象。打从我接受这份教职，我就知道指导研究生是工作的一部分，但当时我有些惶恐，自己的博士论文才刚出炉没多久，就要开始指导别人写论文，而且，我需要一些时间适应“跳伞”（parachute）回到“故乡领土”的生活。所以，我拒绝了，而该学生也未能完成学业。

我觉得我有职责，但是我仍旧依照自己的节奏，以比较自在的步调进行论文指导。在头三年的教学中，指导生的平均毕业率是一年一位。到了第四年，总共有六个学生排队等着毕业。我曾经同时间指导 12 位学生，分别来自我的大学与其他机构。这个数目让我很困扰，又与当时的两个状况有关：第一是结构性的原因，论文指导等服务性工作，理论上不应像教学与研究占据一样的时间与精力，尤其对于刚起步的教授更是如此，但是当时我的大学并未提供配套制度，例如以指导研究生学位论文折抵授课时数。第二个原因是社群支援系统的缺口，教学、指导经验的对话，普遍来说缺乏，而且人际之间的相处是论文指导的特性，这使得指导的经验，甚至不太能公开讨论。例如，教师与学生如何在关起门的办公室内、电子信件往来中，或者利用越来越常见的即时

通讯科技如 MSN Messenger 等进行沟通？在硕士论文计划的不同阶段，教授的期望是什么？相关的资讯与谣言会在研究生的私下讨论圈流传，但这也只是证实了论文写作过程所经历的私人挣扎，是多么地个人而无法公开。而且，如果这种迷思双方都有呢？也就是说，如果导师也与导生的感受一样，对论文工作过程感到如此不确定呢？学生私下讨论圈之所以重要，因为它中介了学院制度性及个人与导师的个别互动。但是导师不是阅读的机器，没有身体、感受或灵魂，究竟论文指导老师能够做什么、应该做什么，而且要做些什么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追求更具互为主体性的答案？

在更大的脉络下，数字带给我的困扰可以启动劳动意识的认识。带动经济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力量，对台湾的大学教育有着深远的影响。最显见的转变，就是台湾在 90 年代早期暴增的大学数量，随即就业市场上大学学历泛滥，使得研究所成为许多大学毕业生预设的选项。大众传播研究所与媒体产业息息相关，吸引了许多来自人文与社会科学背景的学生，其中部分学生会到补习班补充学识，不过一旦学生被师大录取了，他们似乎就被迫要扮演顺从与不能分心的学生，将经济的本能与需求抛在脑后。如果在研究所投身于质性研究与文化研究上，功利的思维更是会被抛在后头，暂时被停止。

如何调度永远有限的时间、精力、资源，是研究所学习与教学的一部分。为了克服过度延伸而难以言说状态，我决定透过“情感”（affect）来理解我在大学的劳动，以挑战数字的“限制”游戏。依照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的观察，全球与后现代经济下的劳动力，现在已超出了古典马克思关于使用价值或货币测量的谈法（Negri 1999）。来自“上面”或“外面”的价值已经难以与情感竞争，因为情感是一股力量，带起行动、改变，以及生产出作为最高劳动形式的生命政治状态。情感精准地命名了我在研究所教学与学习的经验与欲望，无论这些情感是发生在教室、走廊、电子邮件或即时通讯，或者在我贴满海报的办公室的杂乱堆中。

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在其 1997 年的著作《学做工》（Learning to Labor）中，指出了英国政府延长义务教育的规定，加深社会阶级向上流动的迷思，同时，工人阶级文化内，有股支持劳动、反教育的文化力量。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思维环境中教书的我们，顺从地生产与劳动，是制度下再自然不过的行为。只是，将经验放置在劳动的制度性、社会性与全球性的关系之中，“学做工”有无可能发展成类似工人阶级文化当中的抵抗意义。以下各节，我首先将概述“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作为全球与区域知识生产的内在状态，情感劳动意识的培养，在工会制度失能的环境里是

重要的。接着我会讨论如何再现大学老师学术工作的议题。我以质性研究角度，写下三篇虚构的文本，以诠释论文指导的经验，希望借由这种教学与学习的实验性再现，来与学生及老师互动，并重新将学术工作视为是智性、身体、情感与想象的重新整合。

大学工作者与情感劳动

萨义德 (Edward Said) 开始教书时，一位资深的同事告诉他，学术生活很枯燥、附庸风雅、斯文客气的，但是“绝对比工作好” (Said 1996: 224)。一回，在一场满席、无空位的研讨会上，我搬了张椅子入场，同行的朋友开玩笑说：“大学教授应该多多劳动。”为何大学老师对自身的劳动状态常常轻轻带过？除了抱怨讨拍一点也不“酷”，以玩笑带过挫折是一种维系自尊的策略，还有知识分子自我治理的特性，根据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对于阶级意识的形构而言，可以说有结构化 / 被结构的双重障碍：

好的学徒会适应体制的节奏，知道何时他是迟到或早到，举止进退会掌握分寸；同样地，好的教授是在适当的年龄时进入教职，知道何时他是太年轻或太老了，而无法申请或要求一个位置、一个帮忙或一个特权。(Bourdieu 1984: 143 - 144)

采取客观的、技术性的、批判的语言，知识分子时常表达出一种有缺陷的普世阶级意识。知识分子或许会以一种进步的姿态介入研究的主题，并在写作中使用抵抗的语言，但是其专业态度与生命经验之间又是什么关系？这群学术工作者透过怎样的社会关系，去触及社会现实与采取劳动的语言？

把劳工组织起来是个可能。然而，大学教师作为劳动阶级的一分子，其定位必须从在地的物质与意识脉络中进行考量，而非被视作一种普世通行的实践或目标。自2004年起，对学术剥削的批判，例如批判新实施的学术评鉴方法，已揭露台湾与其他亚洲大学教师的代工地位，这套大学教师代工，热衷于内化美国的学术框架 (反思会议工作小组 2004)，却很少有批判性的反省，直接针对教学如何在知识生产的工作中能够扮演一定的角色。

2005年的一个五月天，我遇到了一个典型的难题：该工作，还是该与劳动者站在一起？当天，约有六千名劳工聚集在台北的街头，抗议临时雇佣，并要求组织工会、

集体谈判、薪资协商的权利。小学、中学与大学教师都动员起来，与移工、有障碍的劳工、兼职劳工，还有其他各种劳工一起游行。这是个大晴天，是适合游行的大好天气，但同时也是个珍贵的周日时光，原本可以从事研究与写作，我却与约二十名大学老师加入游行。与各行各业的劳工站在一起时，我能够超越老师是一些附庸风雅（男性）学者的传统形象，并想象大学老师也是劳工。我也开始思考，我如何能够清楚地勾勒出大学老师工作场域的特定经验。

台湾作家兼传播科系教授柯裕棻在给一般读者的书上，有一段学术同侪劳工的声音：

这件事之于大学教授的职业生涯而言，正如同开车之于计程车司机，送信之于邮差，记账之于会计小姐，推销技巧之于业务代表，洗头之于发廊小妹一样。写论文这件事要是做不好，就会失去职业同行的认可，受同侪轻视，绩效评量低落，自我信心破损，哪儿都抬不起头来。这种压力长久累积下来，即使是个大学教授，一样会有忧郁症和职业倦怠症，一旦开始忧郁和倦怠，其症状和其他职业一样，记忆减退，无精打采，易怒，不喜欢上班。（柯裕棻 2003：82）

柯裕棻开玩笑的口吻，传达出大学老师习惯的情绪焦虑。她对学术工作情绪的关注，揭示了“情感劳动”的概念。经济全球化的趋势里，“情感劳动”已经成为最主要且非物质性的劳动形式（Hardt 1999）。事实上，随着电脑化的趋势，人际接触的情感劳动，最能形容诸如医疗照护业、娱乐业、教育等后现代服务产业中的非物质性劳动特质。非物质性劳动所制造的产品是难以触摸的，它们是“自在、安康、满足、兴奋、热情的感受——甚至是一种连结或社群感”（Hardt 1999：96）。在大学的环境中，这种情感劳动在多重方向上作用。“教授常常试图引出与他们互动的人的情绪，这涉及了他们对自己情绪表达的管理。”（Bellas 1999：97）

但是情感劳动的意义，或许比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还要有更广的政治意涵。首先，情感劳动不只是各种有待被“管理”的非理性力量的集合。如果是，它被进一步的生产目的所引导、组织、规训。随着大学教育越来越被整编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之中，情感劳动只会变得更加与学术工作结合。虽然教学不是新的职业，但是为了满足结构性的需求，其经验已有所转变，这些需求除了提供新的知识以外，还包括提供关怀、培力与成长。研究、教学、服务是学术工作传统的类别，这三者皆需要不

同程度的情感劳动。进入到网路、社群通讯时代，情感劳动甚至成了随时，同时必然会模糊了这三个广泛类别的界线。例如，指导学生很少被认为是“教学”，而是被当作是“服务”。但是在我的经验里，与研究生密集的互动，使我不得不去探索我对学术工作的想象，而大量的情感劳动，就成为我学术工作的特征。

在这里，我想邀请我的读者们，特别是师大的学生与同事们，以及亚洲其他的大大学工作者，透过普遍的情感劳动经验来理解学术工作，扩大劳动意识与动能。事实上，愿意认可复杂的情感活动伏流，使我们能够理解学习与教学是一件政治性、变革性的计划，而不是知识的教化灌输。这个观点对我们这些在大学从事批判与文化研究的人而言尤其重要，因为我们领域对批判性的承诺，可能会因忽视或背叛带来更大的伤害。

批判与文化研究认可培力与欲望中的情感关系。然而，如果情感并未被当作资源，用于生产知识与意义，那么它只是服务于情绪的话语，而且如同林沃森（Lynn Worsham）指出，情绪的话语已经进入学校教育最主流的课程（Worsham 2001）。例如，研究生提出文化研究中政治正确的问题其实并不困难，像是“抵抗”（resistance）与“培力”（empowerment）等概念，太快地被学习与轻易地被使用，但是如果这些概念类别不是用来回应真实生活的迫切问题，那么这些概念就还是抽象无感的。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真实生活”的迫切问题，并不只有“远方的边缘族群”才有的经验。有时候，这些问题发生在大学里，是学生与老师们皆以真实的身体与感受互动的地方。

教室里的学生与老师们都是“工作的身体”（working bodies）（Hooks 1994）。如果我们不能谈论我们的身体经验，那么我们即错失挑战校内权力关系的机会。此论述权利对大学教师来说并非自然可得，因为我们很可能在长久的学校制度经验而内化了当中情绪的结构。我在教书教了很多年之后，才明白学生与我一直以来的互动，似乎“缺乏身体”，而总是专注于抽象知识、智性的辩证。师大是间声誉良好的大学，学生们相当自律与奋发向上，但自某个时刻，我开始感到在教室中僵固无法动弹，理想型的学习样态，开始变成是象征暴力的表现，一而再地扼杀了学生文化与经验的欲望。在一场讨论中，学生们表达了对师大在传播领域中不怎么有名的忧心，其中一位研究生在课堂里对我说：“虽然你毋需担心这个，但是我们仍旧活在一个充满世俗成见的世界。”学生没多说，但世俗成见指的就是（竞争的）机构排名、（中产）阶级的举止仪态、（学术的）谈吐、（消费者文化的）品味、（都会有型的）外表、（纤细的）体态、在人生不同阶段（应该有的）成就。这些感受与布尔迪厄对学术界自我导向（self-direction）的批评不谋而合。这些感受也深深影响了我与学生彼此互动的方式，以及我

看待自身教学、学习、劳动的身体。

再现教学与学习

“预计投入多少百分比的时间在这个计划上?”

“百分之百”(科学委员会[现“科技部”]研究经费补助申请程序的固定提问与我曾经给予的回答)。

对学术工作者而言,说明研究与教学既是义务也可能是角力。上述的问题,就是明显的例子,突显了以科学治理的主管机构,如何量化学术劳动的投入,因此有了我讽刺无力的答案。台湾近年来关于学术评鉴的辩论,已经导致新的合理化措施,例如期刊索引、大学排名、奖助纪录等。机构之外,也曾经有取暖、培力的想象与连结,像是2006年在中坜举办的文化研究教学研习营,承认了大学教师劳动条件的改变与压缩的身份。这些另类的空间提供重要的能量,鼓舞我从教学经验中创造意义。以下我进一步描述哪些知识资源,引发我想启动学术劳动的再现政治。

质性研究的传统中,关乎研究者经验的调查通常与再现的方式息息相关。在《玩耍的天地:建立学术生涯》(*Fields of Play: Constructing an Academic Life*)这本具有高度实验性质的书中,女性主义者与社会学家罗瑞·李察森(Laurel Richardson)将学术工作的合作与反思过程(例如访谈、写作、会议交流等),改由戏剧、诗、个人叙事的方式拼凑呈现(Richardson 2007);这些创作文本强调研究者对真实的主张是建构出来的,并且历史化李察森所处的社会学领域,无论是特定的场景或认识论的时刻。卡洛琳·艾利斯(Carolyn Ellis)与阿瑟·波舒那(Arthur P. Bochner)的自传式民族志方法,采用了对话的方式呈现(Ellis & Bochner 2003),使得研究者的调查,成为具有诗意与解决问题的一件事。对我而言,回台湾教学头四年最迫切的问题,一直在于如何进入“不断延长的(大学)学校体验”。教书之前,我不确定我是否真的想要当老师或是学者,我也不晓得如果我当了老师或学者,我要当哪一种。然而,一旦我的互动结构很快地把我放在老师/学者的位置时,长出主体性变成是每日实践下相当急迫的一件事。

阅读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的书时,我松了一口气。在《教学越界》(*Teaching to Transgress*)一书中,她写道:“我的教学方式从根本上已经被我从来不想成为学者的事实所构造,所以我对我自己当教授没有任何幻想,在我踏入教室之前,这已经在我的想象中运作。”(Hooks 1994: 132)我很高兴得知学习不一定是如存款与提

款般的运作，胡克斯在理论与实践之间转换自如的方式，鼓励了教师连结成主动而具体的主体。台湾所熟知的大学教师样貌，是性别与阶级化的绅士学者与照顾周到的教师，但是为了突破这些模式的限制，我开始搜集、共同创造、分析各种可以帮助我理解我在学院主体化的资料。例如，在工作第一年尾声时，我与学生展开非正式的调查、焦点团体访谈、小型会议，评量我中英文沟通上的效果。我持续将课堂上发生的事记录在日志中，尤其是个人与政治交叠的时刻。循着胡克斯、艾利斯、波舒那借着与教师同侪交手而获得洞见的方式，我定期与两个亚洲的大学教师战友互通电子邮件，分享建议与参考观点，彼此鼓励。

除此之外，有两个学术会议使我能够与不同的教师群体接触，但这些教师通常是以研究者的身份为彼此所知，而非教师身份。第一个大会是在台北举行的2005年中华传播学会年会，会议上有几个场次回应各式各样的教学议题，从课程设计到学术及专业论述之间的张力。由于这些场次表达了对台湾新闻与传播教育的关注，因此重点放在该教什么与如何教等问题上，突显了这个领域技术专业化的倾向。不过惊喜的是，就在闭幕场次上，大会安排不同阶段的教师，分享他们申请升等的经验，可能是因为他们自具体的人生脉络中发言，这个时刻带来难得的温度与真挚感。

带着“大学教师如何与其他人讨论教学”这个未解的问题，我于2006年1月参加了为期五天的文化研究教学研习营。该活动举办的目的，很明确地是为了让来自亚洲各类不同机构、年资、国籍、地域、学科背景的文化研究教师，能够“互相取暖”、“交帮结派”。这个研习营达成了这个目的，首先，是因为各个教师有充分的时间聆听彼此与表达自己的想法，分享各自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节点上，接触到文化研究这门学科（蔡如音2006）。参加者分享了个人的历史与强烈推动在自己家乡重新打造文化研究的欲望，他们显露出教师、知识分子，有时是社会运动者的身份，这些都是他们身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阐述文化研究不能化约且动态的脉络。这种再现教学与学习的方式，引起研习营参与者的共鸣。接下来我想要分享自己教学经验中一个迫切的脉络：研究生。

研究生劳动

如果再现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意义一部分来自再现所意指的听众，那么我希望接下来关于论文指导的再现，除了老师之外，也包括研究生。为了不让学生只是我叙

述中的被动角色，我与我指导的六个研究生，在他们学业结束离校前，进行了个别的“离校面访”，我请研究生回顾他们进入研究所、写论文、与我相处的重要转折，并请他们针对访谈逐字稿提出建议与回应。简言之，我的学生是分析材料与意义的共同创作者，我则透过不同的文本形式来促成多元的声音。

在所有的教学经验中，为何着重在这些高度个人化的互动呢？除了对学术劳动中质性面向的关注，我之所以强调论文指导，是因为从中强烈感受到学生面对高等教育“教学暴力”（pedagogic violence）时的挣扎。在现行台湾的脉络中，“教学暴力”可以指涉技术性知识造成的解放——包括“激进”与“批判”的知识也可以有一样的功能。这个价值已经被受到西方训练影响的大学教育者所正式认可。其衍生的后果可以从阶级等级制度的再生产与身体-知识分裂的存在中感受到。为了发展他们个人的计划，我的研究生常常要与这样的“教学暴力”搏斗。在指导论文时，我共享了他们个人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也使我对自己参与学术工作的情感劳动关系更为敏感。

以下我将呈现两篇短篇故事与一出剧本，作为三位研究生 YC、GR、M 与我的论文讨论再现。这三个文本的素材，有离校面访的内容，以及其他相处的记忆与纪录，如课堂的经验和论文提要口试笔记。YC、GR、M 花了大约三年到四年的时间完成他们的硕士学位。以下文本的作用，并非忠实重现我们的互动，而是表达内在于学生论文研究经验与我的教学角色主体化过程中的特定旅程、两难矛盾与情绪张力。每篇文本结尾，借着将这些互动坐落回教学与学习的脉络中，我将提出每个故事的寓意。

“五” 轨

YC 甚至在进入初审名单之前，就知道自己会考上研究所。那是她花了 7 个月的时间在南阳街与其他 200 名学生一起奋斗而来的结果。那年她打败了超过 400 位的考生，被公立大学录取的消息，看来就能证明她的实力，YC 的本科毕业于一间私立大学，虽然没有明讲，她家人对此总有些失望。这回，翻身的机会来了。她正通往更高教育殿堂的道路，有出去留学的机会，也有中产阶级价值的认可。

但是很快地，YC 明白，研究所只是逃避、延后了无可避免的事，也就是做着一份无趣的工作。她早有工作经验，大学时代，她从事几份兼职工作，接连的兼职使她期待能做份“真正”的工作，从中得到不同、更好的经验。大学毕业后，她在高科技公司当过短暂的上班族，这让她想要寻求办公室文化以外更为充实的经验，但研究所似

乎同样令人失望。由于大学学历的贬值，研究所成为合理必然的选择，对很多人来说，研究所并无法回应全球化下工作变动的意义与状态。师大是个建立在相信教育可以带来向上流动的保守大学，学生被期待专注在学术工作上；但是，课业结束后等着他们的究竟是什么？从事初阶的新闻工作、公关、市场行销等故事一直有所闻，媒体传播界有名的雇主，则毫不隐藏他们就是比较偏爱较顺从与成本较低的本科生。媒体之外，也不是每个人都想进入研究与教书的工作。当这些焦虑隐隐约约越变越大时，其实不可能只把研究所想象为一个单纯学习的空间。然而师大的气氛，时常强化了学习与经济、文化活动等领域之间的区分，如何进入学术角色，成了研究生的课题。

YC是个机伶、善于沟通的年轻女性，虽然兼差、工作的事情在所上无法大声张扬，她从未觉得讲述她从事的经济活动有什么困难。她清脆的笑声与略带鼻音的声音，过去常响彻走廊。但是在她修完两年的课后，她的指导教授V突然只听到了寂静。YC是V在美国求学多年后回台湾教书的第一批学生。大多数的学生，包括YC，都对V相当包容，即便她是新来的老师，且常常因为密集的英文解释把学生都搞混了。而每当YC拜访V时，她总是拉把椅子面对她的导师，而非坐在老师桌子对面的矮沙发上。虽然V不习惯在她狭小的办公室中，与她的学生坐得如此靠近，但是她习惯了YC充满活力的性情，欣赏她活泼开心的出现。

V的办公室中，YC讨论着以多层次传销为主题的论文计划，特别是关于年轻多层次传销销售员入行后遭遇到的面子问题。她说着自身逐渐参与传销公司的小故事，以及个人与文化上纠结的两难矛盾，V鼓励YC处理个人经验与知识政治的无可分割之关系。但是无疑地，V并没有预料到YC会接着消失了七个月。

YC回来后，邀请V到学校附近热闹的餐馆共进午餐，她告诉V她在该公司进行参与式观察时，已经成为多层次传销的传销人员。YC边吃着午餐，边表达她的担忧，她担心她的新身份可能干扰了她的研究者身份。

一时间，V以为应该谈论的是“研究者如何影响了她所研究的文化”，但是这个教科书式的提醒似乎文不对题。从YC在公司内的互动比较自在，并且与研究所缺乏沟通等状态判断，V不认为YC是对“告知与同意”的意义有疑惑。她不动声色，咀嚼着盘子里的鳗鱼，此时YC正在形容在多层次传销中，其实与在学术圈一样，如何“丢脸/给面子”都是挑战，可是学术圈对学生，倾向于只允许一种不复杂、正当的身份。所以，是怎么样一个出身精英制度、有自尊心的人，会想踏入一个靠个人网络、像是寄生虫一样维生的行业？在家中，YC的父母与亲戚认为她（再度）偏离了“正轨”，他

们情愿相信她做这行只是为了研究的合理目的而已。

V一口气不间断地完成了学业，深知“正轨”是什么意思，但是她也相信她教授的主题，已经打开足够的空间，允许学生探索人性的广阔。V表达了对YC的支持，她告诉YC，她认为多层次传销对一个硕士研究者而言，并不是一个“不光彩”的工作。接着YC说：

“但是我以为研究者意味着要尽量保持批判与客观?!”

V记忆中的质性研究典范，并非都是保持客观与批判的。但是马上替YC补一堂研究方法的课，无助于解决她的焦虑与“消失”的事实。况且，直到她清光她的午餐后，V才知道“告知与同意”已有了不同的意义，它原本指的是告知与并从研究社群得到研究的同意，而YC从未完全自在地认同学术社群，更别说代表这个社群发话。在这案例中，V所代表的学术社群，似乎才是YC正在告知与取得同意的对象。

“‘五’轨”笔记

“‘五’轨”从一个全知的观点，唱着两个音调相互缠绕的旋律，越唱越走音。这故事始于一个聪颖的研究生被迫离开了研究所，结束于她的导师不情愿但也得承认她所代表的学术权力。YC与V各自对她们自己所占据的“正轨”有着高度的希望，亦即文凭证照社会中的尊敬与有效的研究生教学。但是“学术身份”并非像是一顶帽子可以轻松戴上或脱掉。事实上，对于绝大多数刚进研究所的研究生来说，学术社群的运作是个尚待了解的主题。尤其当中国台湾、大陆亚洲各地的高等学位生产主要是替新自由主义式的国家服务时，这更是如此。

这里有对新生“要有研究生的样子”的结构性的期待，“要有研究生的样子”确切的意思，各校可能都不一样。即便如此，师大与其他类似排名及有地域优势的大学一样，皆倾向鼓励特定的信仰体系，例如向上流动、自律、精英领导。故事中，当YC在田野探索着多层次传销销售员身份时，她的经验体现了作为研究生，“走入当地”的期间，如何感受到学术文化的高高在上。作为老师，我期待我的学生能接受研究者的角色，我所有的教学内涵，像是研究告知与同意的伦理，也唯有每个人进入状况了才可能发生作用。

然而，YC的研究者身份，为什么直到她多层次传销销售员的角色被允许成长后，才得以完全具体成形？改善我的研究方法教学方式，或干脆对学生的选择保留我的评

价，都是明显的解决方法，但并不是一直有效。可是除此之外，眼前还有两个根本的问题。第一，在我们的社会与教育系统中，“智性”与“逐利”的力量之间有着难以贯穿的矛盾，这个问题需要更明确的公开承认。第二，研究所不是个用来宣教、让人改变信仰的地方。老师必须学习接受，虽然研究所期间学生被期待当一个“好学生与勤勉的研究者”，但是学生可能会发现、成为其他的身份。在 YC 的案例中，多层次传销比起研究所教育，可能还要来得开放与给予支持。其他经济身份与主体的类型，仍未在实际层面上被同属于世界一部分的学术界所承认。

手提式乡愁

第一幕：相扑比赛

（七月，台北。V 没有窗的办公室，空调大力运转着。GR 无精打采地坐在 V 办公桌对面的蓝色沙发上。会谈下午三点钟开始，现在是四点十五分。）

V: 说说吧，你目前收集的“台客 热潮”资料中，有多少是来自过去几个月举办的演唱会与宣传活动？

GR: 很多……我认为大概有 60% 或 70%。

V: 短时间内这样真的很多。

（V 暂停，将她的椅子转向一边，盯着天花板。）

很明显，你的分析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浮现歧视台客的结构条件，例如阶级、语言、地域差异。那部分真的很完整，已经有呈现出历史的感觉。

（GR 挺直了背脊，安静地吸了一口气。）

V: 但你也想谈台客的出现是一种文化力量，是多方角力的焦点？

GR: 流行音乐在传达边缘族群的感受上特别重要。

V: 但是如果大部分这些都只是发生在过去几个月，当中几乎是受到媒体的夸耀，而你已经在计划上做了……

GR: 现在差不多两年。

V: 我……我只是不确定你能够或应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评估这个局面。

GR: ……

（V 的内心独白：我以为这次会谈应该会很快且没什么痛苦，我很想去厕所。）

（GR 的内心独白：我们已经定好了论文提要的时间了，为什么我们现在卡住了？

我不懂。)

V: 这只是个建议。或许你应该考虑把第二个部分删除。

GR: ……

(V 的内心独白: 拜托, 表达一下意见。你的斗魂跑哪去了? 过去你都让我用尽所有的精力回应, 但现在这个房间的气氛好僵。)

(GR 的内心独白: 我必须马上决定吗? 这真的让我难受极致。)

第二幕: 别管市场了!

场景一

(师大附近一间小酒吧。八月底 10:20 pm。GR 与同学 M 邀请 V 去喝一杯。M 也在 V 指导下写论文, 坐在酒红色皮革的沙发上放松, GR 则是以她一贯高、快、轻的声调说着话。)

GR: 所有的情况已经改变了。过去几年台客是综艺节目嘲弄的对象, 接着它变成在网路上攻击别人的方式。现在, 他们却有一个台客摇滚演唱会。

M: 改变还真大。

GR: 那是坏消息。我一点也不想要这种炒作出来的。这和我论文一点关系也没有。

(V 拿起高脚杯饮了一口)

V: 这未必不好吧? 你知道你的研究真的碰触到一些关键的东西, 引发很大的反应, 这不是挺让人兴奋吗?

GR: 但是, 我总是对一夜之间变成主流的事物感到怀疑, 改变的速度实在是太惊人了。而且一想到我最爱的歌手居然支持台客演唱会。然后所有特刊的文章都在讲什么是台客、如何成为台客、谁比较台。台客现在变成流行的代表。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当台客。这到底是怎么了!?

V: 这或许只是开始而已。

GR: 我知道这受到人们瞩目, 但这不是我做研究的原因。你还记得两年前我刚进研究所的第一份报告吗? 我就是写这个主题! 那时大众媒体对台客连瞧一眼都没有。现在大家却都在利用这个赚钱。

(M 向 V 及 GR 示意了一下, 要他们瞧瞧房间另一头。在那个角落的黑色桌子上, 有一只坐立不安的黑色兔子。第二只黑色兔子被一位年轻女子从篮子里抱起。GR 转过去看, 但马上就转回来了。)

GR: 我真的很担心这种歌颂台客的流行趋势与态度, 会遮蔽了结构性的问题。如果这推翻了我的假设呢?

V: 别管市场了! 最初是什么推动你接触这个主题的?

场景二

(隔年四月。一场关于台客的文化政治的学术会议。GR与V站在走廊透透气。)

V: 有九篇台客的研究论文! 几个月前这题目只是个会议场次, 现在却变成整个研讨会的主题!

GR: 气氛太过严肃了。我懂这是“学术”会议, 但是在这种理性讨论台客的方式下, 有些东西消失了。我真希望人们把那些理性讨论留在草稿里, 真心来这里对话。我投入了我的灵魂,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吧?

V: 有种共感?

GR: 情感紧密的连结! 与你正在谈论的对象站在一起。我在这里真的觉得不舒服, 但是我不太确定为什么。

V: 或许这是因为这些发表人的现实生活, 与这些他们谈论的对象没有什么关系?

GR: 台客是关于一般大众。每个人都想要当中的一部分。例如我弟, 他就在晚餐时批评, 他觉得我在做的事就是将台客当作理性的知识研究, 但是他却与真的台客一起混, 他们才不管学者办了什么关于他们的会议。正是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些看法, 你才需要使用简单易了的语言。

V: 我了解你的意思。不过我还是好奇, 你的共感是从哪里来的?

第三幕: 只有在台北

(六月底天空明朗的夜晚。GR与V坐在大安森林公园的草坪上。她们手上各有一罐啤酒。远处小丘上是摇滚乐的现场表演。)

V: 那台客是怎么找到你的, 如果你弟觉得你不够“真诚”? 同样的问题在你的论文大纲考试时也出现过, 你的口试委员“误认”你出生在台北并在台北长大。

GR: 谈到误认, 那反过来的状况呢? 有一次我们几个在六楼找到一台钢琴, 我说我会弹, 但没有人相信我。她们要我证明给她们看, 我就证明给她们看。古典钢琴——为什么我的同学不愿意相信我就是会弹古典钢琴?

V: 因为你有乡下的背景? 在台湾中部小镇长大的?

GR: 如果这真的是“血统出身”的问题, 那为什么在我大学搬到台北时, 我还是

觉得有需要隐藏我的台中腔？而且，乡镇并不只是一大片草原。事实上，我一直都知道我在乡镇里的优越位置。我爸爸是小学校长。

V：所以你和台客的关系，就是既处于内在但又非核心。

GR：我决定要写台客几乎是来自一种补偿的心态，他们是我生活中活生生的人。但是电视上，他们就成为了笑柄。我才刚知道台客，他们就被转变为最新的流行风潮，甚至被那些一开始拒绝他们的人认领。但最初他们拒绝台客，就是因为各种负面隐含意义的联想：廉价、仿造、本土。

V：那你还会想回家吗？

GR：一点也不，我不能回家！我或许无法完全认同台北，但是我在这里比较自在。我知道在这里我是谁、我的位置在哪。而且，如果不是因为台北的话，我不可能完成这个论文计划，人只有一离家才会想家，台北把那些情绪都带出来了。我不能回家，我只能把思乡的情绪扛在肩上，继续往前。

（哼着伍佰的歌《下港人在台北市》）

“手提式乡愁”笔记

借剧本的方式述说 GR 的故事，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再现我们互动之间多元的场景，也是希望突显 GR 鲜明的个性。不同的场景上演了 GR 与导师 V 之间仿佛是“相扑比赛”的讨论过程，依据个别学生的不同感受，他们对我的推、举、拍、绊、抛有着不同的反应。第一幕重建了 GR 与我最难忘且最艰难的会面之一，接下来的场景将 GR 的研究主题放在市场力量之中，描绘出她独特的个人特质。市场力量一方面指的是关于特定议题的论述扩张，另一方面指的是研究生圈子里一个主题的流行。尽管剧中 V 说“别管市场了”，但要做到还是很难。

这出剧显示了文化研究的关切，可以因为各种市场力量而变得复杂，这使得学生多少感到他们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理解这些新的力量，需要随时衡量新发展的相关性与她们研究目的的有效性。这出剧也显示了硕士论文的生产，发生在竞争、区隔追求与资源分享的环境中。研究生对研究主题可能瓦解这件事非常敏感，尤其是当不同研究者有着紧密交流的时候。所以为了能够发展她们的研究计划，在幽微而脆弱的状态，她们同时需要有所察觉与把握。

随着台客逐渐商业化并引起学术界的兴趣，GR 便努力占据一个特别的发言空

间，此时我刚好也是 Lady 的导师，Lady 是另一所大学的研究生，正在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台客现象。我们一起工作超过两年。当 Lady 回忆起我们的会面时，她说她总是带着希望与动力离开我的办公室（2006 年 6 月 19 日访谈）。然而，Lady 最终会在其他导师下完成论文。我努力地想要厘清这个指导“失败”的原因，起初我以为是因为我忽视议题性带来的压力，也就是我过度在乎如何给 GR 与 Lady 相对自主的空间来发展他们个别的兴趣，而忘记了“相对自主”并非是我个人可以给予的，研究毕竟还是在社会与文化环境中进行。这个后见之明变得清楚，是在 Lady 成功通过论文答辩之后，我们进行了一次相当投缘的毕业面谈，当时，Lady 回顾她撰写论文所碰到的问题，与多人投入这个议题的“市场性”没什么关联，而是在于如何发展出谈论的动能。在我两年的指导下，Lady 曾经希望从区域认同的角度，讨论台客与“台湾意识”兴起的连结，她参考了比较文学中论述台湾身份认同的文献，并且有一个难得的机会来测试她的解释。她访谈了一位自认为是台客的人，对方不但质疑她几年来所建立的所有理论假设，同时还因为他们之间性别、阶级、地域的距离，让她觉得备受羞辱与心力交瘁。

擦干眼泪后，带着更为聚焦的目标，Lady 修正她的研究计划，转而分析电视再现台客的修辞。在离开面谈中，我想起她对台客的兴趣起于更为日常的脉络，在这个脉络中，时常有台湾文化的自我批判，台湾人缺乏主体性的观察，促使 Lady 选择台客作为分析的目标。台客在大众文化引起的风潮，以及引起的批评，具体呈现了这种矛盾。虽然针对身份认同的辩论有着汗牛充栋的资料，这似乎对 Lady 来说是合理的参考资源，但是这些辩论无法连结 Lady 关注的现实。最后，她针对流行电视节目的扎实分析，使她能够回答她原先所提出的问题。再者，她的研究很有说服力地指出，主流媒体其实屈从于较为诚实且自信的台客精神。

虽然 GR 与 Lady 看似在相互竞争，但是她们彼此真的只是在努力建立起独特的研究声音，而且她们各自都在市场中找到利基。

百科全书 M 及不受控知识的案例

第一次见到 M 时，她惊人的记忆与某种毫无畏惧的举止让我印象深刻。有 M 的课堂是非常有趣的，总是充满了观点与事实的辩论，不停来回交手，当中从未有过沉闷发呆的一刻，通常她对提出的事实与意见相当有把握。我们常常一起散步与聊天。

在她身旁，我时常觉得我像是那些儿童怪诞故事中无关紧要的成人角色，这些故事的主角，通常是像侦探男孩百科布朗（Encyclopedia Brown）或名侦探柯南等聪慧独立的少年。M有她想要解决的“真正的”案子。

一天下午，M走进我的办公室，直接坐到沙发上，白色皮质包包依然紧抱在胸口，她看起来有些生气。

“怎么了？”我问。

“我想不通。我收集了所有的故事，但是我就是无法用一个理论把它们套在一起。你想知道过去两个月以来我的生活是怎么过的吗？”

“我会全神贯注听你说。”

“起床，整天都穿同一件衣服，晚上睡前冲个澡，但我只是换上另一件运动裤而已，我的衣橱在流泪了！我不仅是没离开房间，而且我只有在2×2公尺的正方形空间活动，而且几乎是垂直的活动！我的电脑就在上层床铺下！”

“这样根本没法过活……虽然我记得我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也有类似的经验。”我说，回想起我在爱荷华市一个由车库改装成的公寓里写论文的日子。

“一天就这样开始，又这样过去了，我一起床就带着一个想法：今天，就是我解开它的日子。接着我马上起身，像发疯似地快速翻阅我的笔记与参考资料。我整个都找寻了一遍，但我的脑子就只停留在一点，只有那一点——今天我一定要搞定分析的框架！我快发疯了！我从来没经历过这种我几乎无法掌控的状况。”

“有时候我认为我写了三百页的论文，只是为了学习面对不确定感。”我将脸颊倚在桌上的手。

“你意思是你也遇过焦虑来袭？”

“那是一定的，只是我从来就不相信有绝对可以解释所有事物的理论，理论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解释，而所有的解释都有特定时空意义，包括研究过程本身。的确，无论我们得出什么样的理论，就不是要包含世界的所有一切，但是我们仍必须尊重那些让我们在特定时刻得以思考的人们、资料与想法等。”

M放下她的包包，瞧向她身旁咖啡桌上的糖果篮，她拿出一颗抹茶糖果，就糖果发表意见：

“你重新补货了。”

“拜托，我超爱吃甜食的。”

“唉，我一个月后就放弃一直寻找了。”

“那你誊录了你的访谈资料吗？”

“你怎么知道？”

“刚好猜到的。”我眨了眨眼。

“我把超过一万字的内容都誊出来了，但这变成这个让人看不清楚的‘巨兽’。”

“你大学的时候都没遇过这样的事吗？”

M 确定地摇摇头，把一颗糖塞到嘴巴里，接着说：

“嗯，其实我一直以来都将知识把握得很好，我对知识能收能放，这是个人优点的最终评判。”

“你是否曾经遇过难以驾驭的知识？”

“干嘛这样问？曾遇过，”M 说，不需要定义，“我叫那个‘窍门’。大众传播这个专业领域，充满这类技术性的‘窍门’，就好比诠释时尚杂志的能力来自大量阅读它们。”

“听起来你对这件事没有太认真。”

“我能够处理它，但那种具体的知识形成来自正确的环境与投资，这是文化与经济资本的效果。”M 毫无痕迹地运用布尔迪厄的理论作为她的解释。她继续说：“至于理论，人总能依赖理论。”

“除非有一天这些理论受到像是经验等其他形式的知识质疑，这种挑战一直都在发生。你还记得你论文纲要口试时发生的事吗？一位评委甚至在你进行发表前，就先挑战你的‘天真’。”

“我怎么可能忘记？那一瞬间的事情。”

“确实，我一踏进教室时血压就迅速飙高，我认为在那个点上挑战你的经验是不太公平的，要不然，作研究的目的是要干嘛？你不就应该要走出去，和人聊聊，寻找超越你想象经验的可能性？”

“潜在可能性？”

“换个说法，就是不保证。”

M 停顿下来，整整十秒钟完全地进入自己的思考中。接着她突然大笑，宛如发现珍宝。

“V，那些受访女性的经验真的超乎我的想象，当我浏览一遍所有访谈时，我非常不明白她们为何会跟我透露这么私密的事情。”

“有些研究者会利用她们半权威、半陌生人的位置。”

“那或许是以前的我。但是不同于教科书主张的人道主义，当我在进行访谈时，我才是那个接受治疗的人。”

“你的意思是什么呢？”

M双手交叠说道：“曾经有那么一刻，我觉得我不需要任何人帮我完成研究。更糟的是，我以为我拥有绝对的权力，去判定什么是值得研究的主题，但我从未想过我才是受到他们善心援助的！”

“这就是你为什么 would 认为这个世界绝对可以找到解释一切的理论吗？”

“或许是。”M露出她真诚的年轻笑容。

我离开椅子，接着说，“来吧，陪我走到电梯”。

按了电梯按钮，M告诉我，“V，我需要跟你告解。我其实有阵子对你很不满”。

“真的吗？为了什么事？”

“因为你不直接给我答案。我们几个同学常问彼此：到底V的立场是什么？！我很肯定你是主张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任何后学，但是其他同学有不同的结论。”

“我很少说，‘你错了’或是‘你不能做哪些主题’。”

“对！”M几乎要尖叫出来。“V是否真的相信任何事都是不确定的吗？”

电梯楼层显示停在数字7 1/2。我踏进去，看着仍旧站在电梯外的M。

“V是航行（Voyage）的V。下次再见。”

M点点头，消失在关上的电梯门后。

“百科全书M及不受控的知识案例”笔记

这则故事并没有透露学生研究的实质内容，借着这则故事，我想回应这个问题：“导师可以做些什么？”每个学生都会问这个问题，这也是我随时都在问自己的问题。在这些离开面谈的过程中，我所指导的学生们让我注意到，“与Eva会面”就像是尝试理解一个神秘的事物一样，尽管我可以列出一串我的“服务”清单——从一般咨询、任务导向的麻烦解决，到情绪支持——以便使我的“使用功能”更为清楚明确，但是我宁愿描绘出我的指导风格，而不是内容。其中一个原因是，并非所有的问题都是在面对面会谈的情境中得到解决，其他接触的类型，像是在校园里或线上互动中的闲聊，通常会产生一些指点的效果，连带着帮助学生解决问题。另一个希望超越功效观点的

原因，是因为绝大部分的时候，我更像是个学习者，而非学生研究主题的专家。这个可以产生出具有原创性的研究议题与方法，同时带来了高度的焦虑，不知如何处理未知与毫无规则的事物。

所以我可以替我的导生做些什么？实际上有很多事情是我无法替她们做的。我无法拯救她们的失眠、挫折、停滞，这些都是分析与写作过程中主要的一部分。但是，我可以当个共鸣板，解释与扩大我所收到的讯号。如果可以，我也可以拿起乐器，一起与他们演奏一阵子。通常，我们越是一起练习，我们发出的声音就越好，就算最后演出的曲调更像是对位旋律，而非协奏。

漂流与挪出一个空间

2002年，日本富士电视台制播的科幻电视剧《漂流教室》，对于学习的所在与老师的职务，提出了有意思的隐喻。这部改编自楳图一雄1972年漫画的电视剧（2002），描述一群高中学生与老师，连同校舍校地，突然间从她们的郊区家乡，被迫移到2021年的未来。未来是个荒芜的世界，其中仅存的人类，在环境与道德受到破坏的状态下彼此战斗。电视剧中有一群年轻、脆弱、牺牲奉献的老师，试图带领学生克服这个困难。然而，在漫画原著里，故事是设定在国小，老师们不是早死，就是显露出他们最邪恶的一面，抛下800多名学生自己找路回“家”。我提出这个改编非常多的文本的用意，是因为现今学习与教学的环境，呼应了故事中进退两难的困境：被迫离开与不确定的返家可能。我脑海中所想的，不是那些经常受邀跨国客座的大学教授，而是台湾的“流浪教师”，以及任何难以将大学当家、却实际上与大学息息相关的人。

《漂流教室》中虚弱与邪恶的老师们，因为无法掌控情况，所以失去他们的权威。而有学生们突然被期待在陌生的时空里照顾彼此与发展资源，这提醒了我们需要与任何我们可以学习的对象进行结盟的急迫性。这篇文章记录下我的“学做工”，透过制约的学术劳动，我得以与我的学生们结盟。透过重视生活经验与再现政治的实验性写作（Bochner & Ellis 1996; Ellis and Flaherty 1992），我企图认可情感劳动的生命政治形式。反身性与互为主体的写作，替我从事的教学工作，创造了意义与想象的空间。为了面对自己的主体性、语言与情感，我以指导者、老师、学习者等多个身份书写。如同安东尼奥·内格里所言：“……尚且不提我们的生产性生活，我们的社会生活，被行动的无能、无法创造的挫折感，以及我们正常想象的阉割所淹没。”（Negri 1999: 88）去创

造与去想象将不会带我们任何人回家，但是以这一路上所产生的情绪作为基础，或许刚刚好能够替我们和其他人挪出一个空间，让我们得以继续。

(翻译：郑亘良 校对：蔡如音)

参考文献：

- 反思会议工作小组编 (2004),《全球化与知识生产：反思台湾学术评鉴》，台北：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社。
- 柯裕荣 (2003),《青春无法归类》，台北：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陈冠如 (2006),《“台客”：台湾社会的阶级再生产与文化争霸的可能性》，台湾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 蔡如音 (2006),《文化研究教学营之驱魔取暖笔记》，《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 62 期：269 - 277。
- 赖以婷 (2006),《媒体建构的台客幻想世界：以两代电力公司为例》，辅仁大学硕士论文。
- Marcia L. Bellas (1999),“Emotional labor in academia: the case of professor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61 (January): 96 - 110.
- Arthur Bochner and Carolyn Ellis (1996),“Talking over ethnography”, *Composing Ethnography: Alternative Forms of Qualitative Writing*, Walnut Creek: AltaMira Press, 13 - 45.
- Pierre Bourdieu (1984), *Homo Academicus*, P. Collier (tra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rolyn Ellis and Arthur P. Bochner (2003),“Autoethnography, personal narrative, reflexivity: researcher as subject”, in Norman Denzin and Yvonna Lincoln (eds), *Collecting and Interpreting Qualitative Materials*, 2nd edn,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199 - 258.
- Carolyn Ellis and Michael C. Flaherty (1992),“An agenda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lived Experience”, in Carolyn Ellis and Michael C. Flaherty (eds), *Investigating Subjectivity: Research on Lived Experience*,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 1 - 13.
- Michael Hardt (1999),“Affective labor”, *Boundary 2*, 26 (2): 89 - 100.
- Bell Hooks (1994), *Teaching to Transgress: Education as the Practice of Freedom*, New York: Routledge.
- Antonio Negri (1999),“Value and affect”, *Boundary 2*, 26 (2): 77 - 88.
- Laurel Richardson (1997), *Fields of Play: Constructing an Academic Life*,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Edward Said (1996),“Identity, authority, and freedom: the potentate and the traveler”, in Louis Menand (ed.), *The Future of Academic Freedo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14 - 228.

Eva Tsai (2003), "Decolonizing Japanese TV drama: syncopated notes from a 'sixth grader' researcher relocated in Taiwan",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4 (3): 503 - 512.

Paul Willis (1977), *Learning to Labo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Lynn Worsham (2001), "Going postal: pedagogic violence and the schooling of emotion", in Henry Giroux and Kostas Myrsiades (eds), *Beyond the Corporate University: Culture & Pedagogy in the New Millennium*, Boulder: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29 - 265.